

歐陽修《贈王介甫》“吏部文章二百年”用典爭議考

姜龍翔

提 要

歐陽修曾寫下“吏部文章二百年”詩句贈送給王安石，但後世文人對“吏部”指涉對象解釋紛歧，甚至產生許多扭曲二人形象的故事。此文透過分析歷代筆記、詩話作品中的相關記錄，整理出宋朝文人對此詩句典故有不同的解釋，有以為這是沈約稱讚謝朓之語，有以為這是出自孫樵的文章。並且根據典故來源的不同說法，也發展出了影響二人形象的各種附會故事。這些探索多出於文人閱讀相關文獻時的個人領會，在未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重新解讀詩歌典故，甚至不惜顛倒事實。此文更進一步探討歐陽修發揚韓愈文章的時間點，以及孫樵批評韓愈的用意，指出“吏部”確實指韓愈，“二百年”是歐陽修繼承韓愈文章的時間，“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歐陽修創造的詩句，並無典故來源。透過此文的論述，除可釐清爭議之來龍去脈，對歐陽修、王安石二人形象有更確切的認識外，此文依資料產生順序臚列排比的比較方法，也有助於提供讀者實例，了解如何辨析詩話、筆記中對相關詩文典故說法的原則。

關鍵詞：歐陽修 王安石 酬贈詩 吏部 奉酬永叔見贈

一、前言

中國文學史上多有文人相互酬唱詩作，這類作品以文會友，可用來言志或表情達意，是以探究酬贈詩的交流內容，有助於了解雙方情誼志趣。北宋仁宗嘉祐年間，歐陽修（1007—1072）曾以《贈王介甫》詩贈王安石（1021—1086），並寫下“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名句，後來王安石亦以《奉酬永叔見贈》回報歐陽修，感謝他的愛賞之情。這本是一段文壇佳話，但二人酬贈故事到後來卻演變成雙方互有嘲諷的文筆角力。爭議關鍵主要在起於對歐公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用典的理解差異。由於韓愈（768—824）曾任吏部侍郎，歐陽修又極度推崇他，故學者便將《贈王介甫》詩中的吏部想當然耳地理解為韓愈，加上王安石在酬詩中也明確論及韓愈地位的問題，是以多數詮解歐公詩作者認為“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是希望王安石能承繼韓愈，表現對其寄予厚望的愛重之意。

古人對於人物的稱呼，確實多有將官名借作稱謂之例，是以曾任職吏部者，皆可能被代稱為吏部，未必僅指韓愈而已。於是在北宋哲宗年間開始傳出另一種說法，以為歐公所舉吏部乃指南朝謝朓（464—499）；甚至歐陽修還因此嘲笑王安石於酬詩中誤會吏部為韓愈的謬誤。然隨即也出現澄清意見，指出晚唐孫樵（約867年前後在世）曾撰文讚頌韓愈文章高妙，並以唐代二百年間不曾有韓愈這等文章的說法來讚揚。那麼歐公所用吏部之典，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竟也可套用於韓愈身上；如此則荆公不為錯誤，反而顯其學識更為廣博。說者甚至反唇相譏，責讀書不精者為歐陽修。於是二人互贈詩歌的用典掌故，雖看似愈辨愈明，卻也使二人互贈美意產生質變，蒙上文人相輕的陰影。

《贈王介甫》詩的用典考察紛爭，讓這起文壇佳話幾乎成為惡鬥醜事，影響歐、王形象。歐、王情誼是後世研究焦點之一，兩人多有文字唱和之作，但受到後人對王安石的惡意攻訐，皆曾引發出不小風波。如嘉祐四年，王安石曾作《明妃曲》，頗有對王昭君出塞事件翻案的意思，歐陽修當時亦曾酬和之，但荆

公詩屢遭批評，指其用意有敗壞人心的可能。趙與時（1172—1228）《賓退錄》即載：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¹

《明妃曲》中爭議最大的文句在“漢恩自淺胡自深”，² 違背了儒家尊王攘夷、重視君父之恩的傳統，故被責以有敗壞天下人心的不良影響。王安石另有《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³ 傳聞也曾被歐陽修譏諷用落英飄零形容菊花枯萎爲不曉事，成爲錢鍾書（1910—1998）所謂宋以來談藝一公案。針對《明妃曲》及《殘菊》詩的爭議，學界已有多篇論文探討，但對於《贈王介甫》詩的問題，卻所論不多，陳冬根《歐陽修與王安石嘉祐元年詩歌互贈再議》曾透過二人酬和詩的互贈行動，分析歐、王情誼，不過對於後人對詩句爭議的解讀並未著墨太多，是以此文便擬由此角度重新再探。

從這些爭議來看，歐、王情誼似有齟齬，導致在文字應對上產生諸多交鋒。其中《贈王介甫》詩又是二人交流最早作品，孫光浩便認爲是一切爭議的開端，他說：

此首七律面世，釀成元祐年起乃至南宋末年止，諸多紛爭是非。就此首七律興風作浪，復將荆公一首七絕“殘菊”雜入其中，妄言文忠公與荆公二位於學術認知有所差異及矛盾，頗具煽動之意，惡意攻訐荆公。⁴

1 趙與時：《賓退錄》，卷2，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冊10，頁21。

2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05，頁11b。

3 同上注，卷34，頁6a。

4 孫光浩：《王安石冤屈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頁112。

由於對吏部解讀的差異，竟引發後世對歐、王二人惡意的批評，因此如欲探析後人對歐、王關係的討論，可先由這首詩的問題談起。是以本文便以歐陽修《贈王介甫》詩為考察對象，重探元祐以來解釋者對此句用典本事考察之論述發展，並釐清吏部用典之歸屬，探明爭議變化，述說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學術現象及問題。

二、歐、王酬贈詩的寫作背景

王安石於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聲名逐漸顯揚。當時最賞識王安石者是為曾鞏(1019—1083)，他曾稱王安石“如此人，古今不常有”，⁵並居中牽線，極力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慶曆七年時，曾鞏持荆公文章往滁州登門拜訪歐陽修，歐公閱讀後，讚賞不已。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提到歐陽修對王安石的愛惜之意：

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⁶

歐陽修善於提拔後進，世所周知。《四朝國史本傳》便記其：“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⁷尤其他曾對梅堯臣(1002—1060)表明要放蘇軾(1037—1101)出一頭地之說，更是為人所樂道。他對王安石的提攜，雖在中舉之後，但以其文壇盟主的地位，稱讚荆公文章世無所有，冀其能光耀於世，深切蘊含歐公愛重之意。歐陽修期待能與王安石相會，無奈總是緣慳一面，

5 曾鞏：《元豐類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98，卷15，頁11b。

6 同上注，卷16，頁7b。

7 歐陽修：《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02，頁7a。

一直等到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調來京師之後,歐陽修寫下著名的《贈王介甫》表達敬慕之意,二人方有較明確的往來文字紀錄。此詩云: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試拂弦。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⁸

歐陽修以翰林與吏部在詩文上的崇高表現作為開篇,翰林蓋指李白,吏部則多被認為是韓愈。歐陽修對韓愈的推崇自不在話下,然其對李白(701—762)評價亦頗高,《太白戲聖俞》稱李白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卻視蜀道猶平川。”⁹故歐陽修將李白、韓愈對舉論述,亦屬合理。那麼若以翰林李白、吏部韓愈來譬擬荆公,這對當時算是後輩的王安石來說,自是極佳的讚譽之辭。

歐陽修接著感慨自己年老衰朽,雖有心繼續創作,但應該無法再與王安石爭先了。歐陽修當時為五十歲,算不得太老,可視是謙辭。接著話鋒一轉,以朱門歌舞之艷麗浮靡,與綠綺古琴蒙染塵埃為對比,大抵可視為概述文壇風氣的轉變,有如古文運動文學立場下時文與古文的對比,亦可視為儒學道義傳統下古道與今道的差異。總之,歐陽修期許王安石能夠不受世俗流行及官場生活的不良沾染而改變初衷,也算是長者的殷殷期許。最後一聯則是盼求能與王安石會上一面的客套話。

收到贈詩後,王安石即刻拜訪歐陽修,兩人相談甚歡。王安石感念歐公對他的器重,便寫下《奉酬永叔見贈》回應贈詩。其詩云:

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⁸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57,頁813。

⁹ 同上注,卷5,頁86—87。

摠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坐中。
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貺豈宜蒙。¹⁰

有別於歐陽修透過翰林、吏部借代李白、韓愈來稱許王安石的委婉筆法,荆公略過翰林不提,逕以孟子及韓愈回應。酬贈詩論述對象的差別,讓後世文人以爲這是要表現他不願學習李白的高傲態度。王安石對李白究竟抱持甚麼樣的態度?他曾編選《四家詩集》,以杜甫爲首,依序爲歐陽修、韓愈及李白,釋惠洪《冷齋夜話》提及荆公將李白次於歐陽修之後的用意: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¹¹

釋惠洪指荆公稱李白詩歌十之八九都在寫婦人、飲酒,識見卑下,故次序歐公之後。但陸游《老學庵筆記》認爲這應非王安石的用語,他說: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¹²

無論王安石自身究竟是否看得起李白?上述這類爭議的傳聞,可能也加深讀者認爲王安石輕視李白的質疑,加上《奉酬永叔見贈》確實未論及李白,是以學者多傾向王安石乃不屑於承接李白,逕行選擇忽略,由此也導出他不滿歐陽修

10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22,頁3b。

11 惠洪:《冷齋夜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冊9,卷5,頁54。

12 陸游:《老學庵筆記》,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5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冊8,卷6,頁73。

稱許的傳言。

王安石從韓愈說起，並拈出更高層次的孟子，明白指出他重視的是繼續孟子傳道之功。王其俊認為王安石這樣的說法是：“明確表示自己不願意做像韓愈那樣傳道不明的文人，而願意步孟子後塵，接續儒學道統。顯然，王安石已把孟子作為自己的千古知己和理想人格。”¹³這句“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除是王安石個人志向外，也道出在北宋《孟》學史相當重要的一個轉折，陳逢源即說：

北宋諸儒以孟子自許，王安石（1021—1086）乃是最為重要人物，《奉酬永叔見贈》標舉“道義”與“文學”，指出與歐陽修不同的生命情調，重視韓愈的儒者被歸之於“文學”，至於儒學所重之“道義”，則另有不同的目標，所謂“能窺孟子”，“何敢望韓公”的期盼，在孟子、韓愈之間，王安石關注所及，乃是孟子以道自任的情懷，對於孟子傾慕，更勝於韓愈。¹⁴

王安石對孟子的高度推崇，表現他不欲以韓愈文學為目標，冀能由儒學所強調的道義，上承以道自任的孟子。王安石曾直接稱孟子為聖人，有別於當代學者仍稱孟子為亞聖，或視其為五賢之一的賢者認知，對於孟子地位的提升，他的助益甚深，孟子得以配享孔廟，亦由其所請。從此詩來看，王安石雖似謙稱不敢自比韓愈，但他似乎並不打算把韓愈當成學習目標，從其《韓子》詩中對韓愈的評價也可見出他的想法，他批評韓愈說：“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¹⁵態度有別於歐公對韓愈的高度推崇。王安石不願只是停留在韓愈的層次，對自己有更深的期許，要能承接起孔孟大道，復興發揚儒學之道義。

北宋文學家原本亦矚目於韓愈的文學傳道運動，但由於韓愈技法高超，文壇漸偏向於學習效法韓文寫作筆法及藝術形式，反而忽視他所強調傳道的儒

13 王其俊主編：《中國孟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368。

14 陳逢源：《從五賢信仰到道統系譜——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聖門傳道脈絡之歷史考察》，《東華漢學》第19期（2014年6月），頁130。

15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34，頁10b。

家精神。因此,王安石特別將孟子與韓愈二人對比,甚至表明不取韓愈的態度,這都是有心改正當時過度重文輕儒的傾向。這樣看來,王安石似乎有意與歐陽修立異,展現後生晚輩勇於向前輩學者剖明志向的態度。然而從兩首酬贈詩推崇對象的差異,種下後人解說紛爭的因子。這些紛歧的解釋究竟是有所考據?還是傳聞失實?抑或摻雜有心人的傳播?以下便就相關論述說法作一闡析,以探其變化源流及產生原因。

三、“吏部”用典的爭議變化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崩殂,年幼的哲宗繼位,宣仁太后垂箔聽政,重用司馬光等反對新法人士,開啟新舊黨爭傾軋局面。元祐更化之際,王安石已辭世,但舊黨人士對於王安石變法所造成相互詆毀排擠的局面,仍有不滿,於是多有清算鬥爭王安石之說,甚至南宋之後,更把北宋滅亡的原因歸諸其身,趙翼便曾說:“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¹⁶他雖認為成敗關鍵應在神宗,但從其所說人皆咎安石為禍首,則知變法失敗後的王安石,已成為眾矢之的,相關責難也陸續出現。甚至還出現有如預言般毀謗王安石的《辨姦論》。蘇洵將王安石比作王衍、盧杞等小人之輩,甚至譏其“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¹⁷近乎人身攻擊。邵伯溫《聞見錄》提到《辨姦論》的著作原由: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為荆公發也。¹⁸

16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26,頁560。

17 蘇洵:《嘉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04,卷9,頁21a。

18 邵伯溫:《聞見錄》,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冊7,卷12,頁193。

今多有學者疑《辨姦論》乃邵伯溫(1057—1134)贗作,然即使這段聞見內容出於邵氏虛構,但至少反映出在他的認知中,歐陽修與王安石二人當時關係頗為交好。大概邵氏不滿歐公竟不識王安石之奸惡,才会有蘇洵撰《辨姦論》批評王安石,冀望歐公醒悟的傳聞產生。也因此對王安石的批評不只在新法後果的批判上,更論及其性格、交友及學術思想等各個層面。

《辨姦論》後,陸續又出現許從負面角度評論王安石的言論,到了《宋史》更將王安石描述成忌刻寡薄之人,所行新法幾一無用處。以致於學界普遍形成一種看法:從北宋以後,貶低王安石成為對其人其學的評論主流。蔡上翔在其《王荊公年譜考略》開篇便云:“世人積毀荊公,幾同於詈罵,不啻千萬人矣。”¹⁹梁啟超則說:“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²⁰仿佛天下萬口交訕,皆以攻擊王安石為事。然而蔡上翔、梁啟超二人也注意到確實仍有少數人願為王安石澄清,表示流俗對王安石未必盡皆污蔑之說,這從《贈王介甫》吏部用典的詮釋問題,亦可見出一斑。故而以下便就宋人筆記、詩話中討論此詩掌故的過程,析其變化脈絡,並由此檢視當代對王安石批評之現象。

(一) 歐陽修用典的爭議開端

最早對《贈王介甫》詩中“吏部”用典發生爭議的時間,當在元祐更化之時。吳玠(1067—1144)《優古堂詩話》中曾記韓駒(1080—1135,字子蒼)之言曰: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為吏部尚書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為退之矣。²¹

19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卷首,頁1。

20 梁啟超:《王安石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2。

21 吳玠:《優古堂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35。

韓駒指出歐公詩中所用之吏部指謝朓,典故出自《南史》,二百年為沈約稱讚謝朓二百年來無此詩的用語。查《南史》原文云:“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²²沈約用“二百年來無此詩”稱讚謝朓五言詩,看來確與歐公詩句相近。韓駒雖能夠舉出典故,說似有理,但畢竟與一般共識有別,由此便也開啟對吏部用典的解讀爭議。

韓駒生於神宗元豐三年(1080),歐陽修已卒,王安石則死於哲宗元祐元年(1086),此時韓駒年紀尚小,故他對吏部的用典說明不可能是親受自二人的見聞,那麼韓駒的論斷從何而來?是自己的考察,還是另有所據?北宋莊綽(約1078—?)《鷄肋編》可提供答案:

歐陽文忠《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為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²³

莊綽生於元豐元年²⁴(1078),據他所說,少時便曾聽過吏部是指隱侯沈約。若

22 李延壽:《南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冊22,卷19,頁12b。

23 莊綽:《鷄肋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冊7,卷上,頁6。

24 宋人程俱《北山小集》卷10有《送莊大夫綽赴鄂州守》詩曰:“白首同經本命年,君臨方面我歸田。”程俱於詩中自言與莊綽“同經本命年”,則二人應是同年出生。據宋人程瑀《程公行狀》知程俱卒於紹興十四年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可知其生年為1078年。(相關考證可見錢建狀、王兆鵬:《宋詩人莊綽、郭印、林季仲和曹勛生卒年考辨》,《文獻》2004年第1期,頁100—107)。

以少時爲他九到十八歲的青少年時期，當時正值元祐更化之際。韓駒年紀與莊綽相近，二人應該都是在少時聽過類似的傳聞，那麼韓駒、莊綽之所以會去翻查《南史》及《梁書·沈約傳》，大概也有出於確認典故疑義的動機。

由於這件本事推敲意在諷刺王安石錯認對象，所以莊綽少時聽聞的說法，目的大概在嘲諷荆公錯認典故。莊綽父親於元祐時曾與蘇軾、黃庭堅等人交游，與其少時時間相符，則傳聞或許與元祐黨人對王安石的否定有關。在《雞肋編》中便曾載范仲淹次子范純仁家中因藏有《推背圖》，險遭王安石迫害的情形：“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遽請追逮。神考不許。”²⁵明顯有要將王安石刻畫成藉故報復的小人形象之意，但這也是莊綽不及親見的傳聞。陽繁華、唐成可《論宋人筆記小說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便說：

宋人筆記小說中關於王安石的軼事多出自他的政敵，或持否定新法的人之手，對此不加以辨鑒，籠統裒輯在一起，使本身就存在的事實錯誤以訛傳訛。因此，王安石的形象在宋代受到譏毀是有著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的。²⁶

宋人筆記小說中頗多記載王安石負面軼事，其中某些內容說得活靈活現，仿若親見，不免令人質疑真實性。所以陽繁華認爲大概出自於政敵或否定新法者之手，意指其多爲向壁虛造而成。然筆記、詩話中關於詩文用典本事的探討，不只會記載所聽得的傳聞，也常表現出讀者自身的領會，尤其對所謂用典本旨的探討，若作者未曾明言，後人的解釋就等於是爲詩作箋注，乃出於個人的見解，其中不免有欲突顯才學的動機，摻雜好奇炫博的成分，若再由此推敲作者寫作心理及相關軼事，則其中的是非曲直，便有待檢視。如莊綽少時所聽聞的隱侯，乃沈約謚號，但《南史》分明記載這是沈約稱讚謝朓的用語，反過來指沈約，即是明顯解讀錯誤。又觀莊綽所說，他是後來見到《沈約傳》，方知歐公用典之法

²⁵ 莊綽：《雞肋編》，卷中，頁66。

²⁶ 陽繁華、唐成可《論宋人筆記小說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頁34。

是將沈約讚語移諸於韓愈身上,是以他認為典故本事雖是沈約讚揚謝朓,但無礙於歐陽修將之翻新轉變成對韓愈的稱頌。莊綽雖修正少時以吏部為沈約的錯誤傳聞,但他未考慮把吏部連結為謝朓,依舊認定就是指韓愈,等於是在典故證據上,又發揮了自己的意見。如此看來,少時傳聞是原始說法,乃明顯誤用,此說啟發莊綽及韓駒進行考證,故二人雖分別找出原典為據,但已屬於個人的考索論點,未必就是真正的本事,只可視為對歐公詩歌解讀的意見之一。

至於將吏部指為沈約,雖是明顯誤用。不過,據《梁書·沈約傳》載,沈約在南齊時亦曾任吏部郎,南梁時則任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原來沈約、謝朓、韓愈三人皆曾任職過吏部,無怪乎說法會如此紛歧。但沈約雖曾任吏部官職,二百年無此詩是他稱讚謝朓之語,歐公除非錯用,不應莫名指為沈約。只要稍微翻查《南史》、《梁書》,便不難發現錯誤。但以吏部借指為謝朓,是否就合乎典故的敘述?陸家驥認為會將吏部解釋成謝朓,是故意標新立異,他說:“衡以常情。韓愈之聲望,尤其在北宋時,高出謝朓多多。韓常被尊為吏部,謝則人多以宣城稱之,未聞有稱其謝吏部者。”²⁷一般人從常情來看,確實都傾向於以吏部為韓愈,但陸家驥說無人稱謝朓為吏部者,則非事實。王維曾作碑歌頌苗晉卿(685—765)德政,《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稱其詩云:“時人以為鮑參軍、謝吏部為更生”,²⁸鮑參軍為鮑照,謝吏部為謝朓。又唐李嗣真(?—696)《書後品》列書藝下品十三人中有謝朓,亦云:“謝吏部、庾尚書創得今韻”,²⁹也是以吏部稱謝朓。可見正是因為吏部絕非韓愈一人專用,才會造成諸多不同解釋的空間。

據《雞肋篇》書前自序所言,此書成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韓駒則卒於紹興五年(1135),二人是元祐之後才成年,故他們提出吏部新解的時間點,應該就在徽宗到南宋高宗初年的期間。吏部為沈約的傳聞雖被莊綽修正,但他依舊認為吏部應指韓愈;韓駒則把吏部解讀為謝朓,並藉此嘲諷荆公錯認典

27 陸家驥:《對聯新語·辨誤第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133。

28 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71,卷22,頁5b—6a。

29 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卷3,頁111。

故，也成為此爭議中最早批評荆公的言論。此種爭議之所以興起，不外乎文人附會，或出自元祐黨人的誣陷，對典故尚未能精準掌握，以致造成解釋對象的混亂。

自《南史》典故被翻找出來之後，這種以為王安石誤認說法開始流行，但也有人表達不認同的意見，宋胡仔（1110—1170）《荅溪漁隱叢話·六一居士下》引《漫叟詩話》便說：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荆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荆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³⁰

《漫叟詩話》內容泰半散佚，作者不詳，今人李貴則考察當為臨川李公彥（1079—1131）所著。³¹ 李公彥生於元豐二年（1079），為哲宗元符三年（1100）時進士，與莊綽、韓駒年紀相近。李公彥雖以為吏部是謝朓，但並未提出新證，可見應是接受韓駒之說。李公彥認為荆公酬詩雖提到孟子與韓愈，但這是他自抒己意，並不是在應和歐公詩中的吏部，兩詩其實互不相涉，並沒有誤認掌故的問題。李公彥不認同韓駒批評王安石誤認典故的說法，提出二人詩歌乃各自詠歎，互無關涉的結論。歐公吏部對象的爭議本屬於掌故出處的探究，但由於韓駒暗諷王安石誤認典故，於是李公彥雖承認吏部可為謝朓，但已在為王安石找下台階。李公彥對歐、王二人情誼並有所敘述：“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眾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³² 他並且稱讚王安石《定林後詩》精深華妙，評其《歲晚詩》：“自以比

30 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前集》，《筆記小說大觀》（第35編）（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冊1，卷30，頁209。

31 見李貴：《〈漫叟詩話〉作者李公彥及〈全宋詩〉〈全宋文〉相關詩文考論》，《東華漢學》第14期（2011年12月），頁83—103。

32 胡仔：《荅溪漁隱叢話前集》，卷34，頁230。

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³³由此來看,李公彥的立場較傾向維護荆公,惟二詩互不相涉之說也是個人的臆測。然爭議發展並未就此停歇,後續還逐漸演變成歐陽修、王安石二人相互批評指責的尷尬場面。

(二) 王安石酬詩的心態爭議

此詩爭議除典故出處問題外,探討王安石的心態也成爲討論重點。葉夢得(1077—1048)《避暑錄話》便云:

王荆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荆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群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倘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而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荆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荆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荆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可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³⁴

據葉夢得所說,荆公確實也將贈詩中的吏部直接視作韓愈,但他對歐陽修這樣的奉承感到不滿,認爲非知己者所應言,於是在《奉酬永叔見贈》寫下“此身安敢望韓公”,將歐陽修譬比爲韓愈,而以孟子自期,頗有彰揚自我,要超越歐公的用意。但葉夢得認爲歐陽修並不在意,他舉歐公曾推薦包括王安石在內的政敵爲宰相,推崇其修養高度。葉夢得屬於新黨,《四庫全書總目》說:“惟本爲

3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33,頁222。

34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冊10,卷上,頁274。

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³⁵葉夢得雖多陰抑元祐黨，然由於後來蔡京與王安石產生嫌隙，所以他對荆公亦多有譏評。而歐陽修早已辭世，與後來的黨爭無關，所以葉夢得並未吝於頌揚歐陽修。然而這段傳聞紀錄重點雖在褒揚歐陽修，但也隱含暗諷王安石高傲自負性格之意。

葉夢得這番“自期以孟子而處公以爲韓愈”的說法，深化到心理層面的探索，也將原本用典爭議的單純問題，推展變成歐陽修與王安石孰爲優劣之比較。蔡上翔說：“至如葉夢得素好譏切荆公，此記亦徒爲後來誣荆公詆毀歐陽張本，同歸於無稽之言已矣。”³⁶也把葉夢得的記述當成開啟誣蔑詆毀歐、王二人之張本。不過葛立方（？—1165）則有意爲王安石辨護，《韻語陽秋》云：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受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³⁷

據葛立方所說，當世傳聞認爲王安石不滿意歐陽修只以李白、韓愈來譬況他，卻不能用更高層次的孔子、孟子對之期許，於是以此爲恨。這樣的說法較葉氏所言，多添加情緒上的表達。葛立方主要活動於南宋高宗時，被後世歸屬爲秦檜黨人，秦檜又比較支持王安石新法，所以其立場可能因此而傾向荆公。爲反駁葉夢得所傳荆公不滿歐公的說法，葛立方舉曾鞏寫給王安石的書信爲證，指出歐陽修曾鼓勵王安石不必過度模擬孟子、韓愈，取其自然即可，認爲王安石

³⁵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221，頁8a。

³⁶ 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5，頁84—85。

³⁷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18，頁239—240。

依舊推崇歐陽修在文章藝術上的高度表現,是心悅誠服地歸附歐陽修,並無葉夢得所說王安石以韓愈處歐公,以孟子自比的自負之意。不過,葛立方所提出的書信證據,只有歐陽修單方面傳遞的信息,王安石是否接受?難以論定。但葛氏的澄清,也表示當時輿論並非一味倒向以諷刺荆公爲事。

對於王安石這種以孟子自比,視歐陽修爲韓愈的譬比方式,雖有葛立方爲之辨駁,但有心人依舊解讀成這是王安石自視高傲的表現,藉由貶低韓愈與歐陽修來自抬身價,因此討論者便紛紛轉向批評王安石,或批評其心態錯誤,或指責他根本不符合歐陽修的期許。王十朋(1112—1171)《梅溪集》云: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爲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略曾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無愧色。³⁸

王十朋話說得頗酸,他認爲歐陽修應該要把這首詩轉贈給蘇軾,如此更能符合贈詩者及受詩者的特色。他並暗示王安石雖貶低韓愈,但成就根本不能與之相提。王十朋順著葉夢得的說法而發揮,意在強調王安石過度自負自大的心理。另外,李壁(1157—1222)《王荊公詩注》引王儔之說也指出王安石不願以韓愈爲標榜,甚至還有反諷歐陽修之意:

河東王儔尚友嘗爲予言:“觀介甫何敢望韓公之語,是猶不願爲退之,且譏文忠之喜學韓也。”然荊公於退之之文,步趨俯仰,蓋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言若是,豈好學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³⁹

38 王十朋:《梅溪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51,卷19,頁10a—10b。

39 王安石撰,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33,頁613。

相較於葉夢得僅論及王安石不願被比爲韓愈，王儔又添加王安石譏諷歐陽修喜學韓文的推測。李壁也附議王儔之說，認爲王安石雖表明不願學韓愈，但私底下卻是學韓之佼佼者。李壁並以學者慕至所未至，而厭其已得的通病，來解釋王安石的心態。值得注意的是，李壁注王荊公詩之目的在爲其辨誣，卻於此詩引王儔所言來箋注荊公，帶有批評之意，故蔡上翔便曾感嘆：“王儔說亦謬，而雁湖並錄之，何也？”⁴⁰雁湖就是李壁。王儔的推論確實是主觀無據之說，李壁根據其說又下心理推測之論，也同爲謬誤。觀王十朋、王儔等人所言，大抵根據葉夢得所發，並進而批判王安石性格心態，使此爭議導向對人格的攻擊。甚至不只品評王安石而已，連歐陽修也一併受到牽連。

（三）歐王互誚的形象爭議

在上述爭議的發展變化中，王安石被刻畫成自大驕傲者，既錯認不滿歐陽修的吏部稱讚，又自抬身價，刻意貶低歐公來彰揚自我。然而同一時間，竟有文人宣稱找到更適合“吏部文章二百年”的用典來源，證明王安石並非誤用。朱翌（1097—1167）《猗覺寮雜記》云：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⁴¹

朱翌宣稱根據他的考索，“吏部文章二百年”乃化用唐末孫樵的文句。孫樵在寫給高錫望的書信中，提到唐代二百年來獨高韓吏部文章之語，歐公

40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5，頁84。

41 朱翌：《猗覺寮雜記》，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3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冊10，卷上，頁36。

正是用此典故，吏部確實可指韓愈，所以王安石並未錯認。此語一出，又為此爭議再掀波瀾，著者題名為陳鵠（約 1174—1224 在世）的《耆舊續聞》更增添其事，綜合前述典故爭議及王安石不滿譬比為韓愈的傳聞，變造出新的內容。他說：

中書待制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乃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荊公之詩為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⁴²

《耆舊續聞》根據朱翌所言，增加對話情境，將吏部謝朓改造成是歐陽修自己說出口的澄清內容，並指正王安石錯認他的用意，否定從韓愈迄今二百年之數目。然據前引名公詩話來看，雖有論證歐公吏部用典出自《南史》者，但並未導出這是歐陽修自己的說明，且未述及歐公對王安石有直接的批評，然《耆舊續聞》甚至虛構了二人互誚之言，先是歐公責怪王安石弄錯典故，後又變成荊公諷歐陽修讀書不博。歐、王學識廣博的比較仿佛一場公案，尚見於二人對《殘菊》掌故評論的場景中，《山堂肆考》載歐王相笑之事云：

王介甫《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賦。’落英亦

42 陳鵠：《耆舊續聞》，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冊5，卷1，頁42—43。

《楚詞》語耳。”⁴³

這則記錄也寫到王安石批評歐陽修有不學之過，與《耆舊續聞》諷刺讀書不博的說法如出一轍。認為歐陽修學識較高者，便執吏部為用典謝朓之事來嘲諷王安石在酬詩中認錯典故；支持王安石學識較高者，則認為歐陽修用的是僻典，少有人知，王安石則用熟典，更適合用來解釋歐陽修的詩意。另外，朱翌在《猗覺寮雜記》指二百年來獨高韓愈的說法是在孫樵寫給高錫望書信中提出，但在《耆舊續聞》中卻變成出自孫樵直上韓愈的書信中，這又是傳聞失實之處。《耆舊續聞》雖提出完整對話及情節，但其中頗有變質內容，若未細辨，很容易誤以為真有其事。如馬斗全《南窗雜考》便引此事批評時人錯認典故，他說：“關於歐陽修‘吏部文章二百年’之用事，有一段逸事，須先一說。”⁴⁴其後所引逸事就是《耆舊續聞》載錄的內容。是以此說若不加細辨，將會誤會歐、王二人之情誼關係。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錄》指出南宋對歐、王二人贈酬詩的不同解讀，原因在於：“除了詩人的非凡的想象力外，不可忽視的是南宋時‘妖魔化’王安石風潮的一種折射或投影。”⁴⁵將王安石妖魔化、小人化是南宋風議的主要潮流。但也可發現，在這股妖魔化潮流下，仍有願意為王安石辯護的意見，如李公彥認為唱酬詩各有各的論述立場，葛立方認為荆公乃誠心依附歐公，朱翌更根據自己的考察，指出典故來源並非《南史》，而是出自唐末孫樵的文章，王安石並未錯認。其後《耆舊續聞》也編造情節，使其成為歐、王較勁，荆公占上風的故事。可見當時未必盡皆都是要清算王安石的風氣，後世學者過度關注這股小人化、妖魔化王安石政治人格、學術思想的潮流，相對地卻忽略王安石的影響力並非皆止於負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即載宋高宗與范宗尹的對話內容：

43 彭大翼：《山堂肆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977，卷199，頁6b—7a。

44 馬斗全：《南窗雜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9。

45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頁385。

(高宗)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被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上深以為然。⁴⁶

高宗企圖諉過王安石,固然有時代背景的考量,然范宗尹的澄清則代表清醒的士大夫未必盡把王安石當成代罪羔羊。

四、“吏部”用典問題之辯析

吏部典故在南宋時雖逐漸趨於指向韓愈的用法,不視之為刻意的僻典,但後世文人論起此詩時,依舊依違於究竟是用謝朓或韓愈之典故的爭議中,如明末吳景旭(1611—?)《歷代詩話》仍以吏部為謝朓,但又批評葉夢得的說法誣枉了王安石:

永叔《贈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吳旦生曰:《南齊書》吏部侍郎謝朓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永叔引此事,人徒見荊公答詩有“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之句,遂認吏部為韓公耳。葉石林謂荊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正坐此誤也。⁴⁷

吳景旭繼承韓駒的看法,但把《南史》及《梁書》的內容錯引為《南齊書》,並以為誤認吏部韓愈是後人不察之過。清人潘永因注《宋稗類鈔》則以為應當仍作韓愈解:“吏部文章日月光,自然以吏部為退之。”⁴⁸這樣的論斷似乎也是出於

46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325,卷34,頁22a—22b。

47 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483,卷56,頁10a—10b。

48 潘永因:《宋稗類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34,卷19,頁8b。

主觀的心理推崇。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對此爭議則作出詳盡考察，他先就酬贈二詩所表現出的歐、王情誼進行勾勒。蔡上翔說：

歐陽公詩好李白，文宗韓昌黎，故云“老去自憐心尚在”三句作一氣讀，蓋公所以自道也。後來誰與子爭先，則始及介甫矣。唐鄭谷讀太白集詩曰：“高吟大醉三千首。”此首句所由來也。“唐以文取士，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一見於孫樵集。若如歐公記舊本韓文云：“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又寄蘇子美詩：“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則皆可為次句確證。首言詩，次言文也。韓子蒼見《南史》辭句偶同，遂強作解事，歐公豈於謝朓詩肯自言老去自憐心尚在哉！介甫詩曰：“欲傳道義心雖壯，強學文章力已窮。”言壯心猶在道義，若文章至力窮之後，雖終身望韓公不能，此正答後來誰與子爭先，而若不敢以韓公自任，曷嘗怒歐公以退之相比哉！合觀二公詩，其為交相傾服，何其至也。故朱新仲之言是也。⁴⁹

蔡上翔認為歐公贈詩前三句是在寫自己的心聲，“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指他本身推崇李白、韓愈詩文的立場；“後來誰與子爭先”才轉為對王安石的期許。翰林、吏部並不是用來讚頌王安石，只是在寫自己致力繼承李白、韓愈的文學表現。王安石也明白歐公之意，因此酬詩中“強學文章力已窮”、“終身何敢望韓公”非反諷之語，乃謙稱自己雖將盡力窮索，以報答歐陽修“後來誰與子爭先”的期許，但並不敢自謂能夠上承韓愈。

蔡上翔的解釋明顯在為荊公翻案，他認為若歐陽修在初識王安石之際，便貿然以李白、韓愈譬比之，將有過譽之嫌，遂認為吏部及翰林只是歐陽修用來述說自己心中所認知的文學史既然事實，是值得學習的典範對象。王安石的酬詩也在回應歐陽修所建立的典範目標，謙言自己不敢誇口上承韓愈，故蔡上翔認為二人的酬贈詩確實是交心之辭。蔡上翔雖把握到從二人在結識之初應

49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5，頁84。

該會秉持的禮貌原則來詮釋,但他只著重在以李白及韓愈為目標來談,迴避王安石另舉出孟子的問題,是否準確反映王安石的想法?仍不無疑義。至於吏部文章二百年的掌故來源,蔡上翔認為這是韓駒自己偶然讀到而強解的說法,不足為據。掌故出處除源自於孫樵文章外,歐陽修自己亦多次提及這個數目。他舉《記舊本韓文後》“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⁵⁰《讀蟠桃詩寄子美》“寂寥二百年,至寶埋無光”⁵¹為證,認為這些都是歐陽修用來計算韓文由隱而顯的詩文語句,與“吏部文章二百年”年數、語氣相合。最後,蔡上翔總結前人說法的謬誤,他贊同朱翌,指責王儔、葉夢得等人說法是導致後世學者詆毀歐陽修及王安石交誼的張本。

蔡上翔從禮貌原則分析解讀,擺脫歐、王二人初識即互誚的爭議。雖仍有問題待澄清,但他指出歐陽修自己多次使用二百年形容韓愈文章重現的時間,相當值得參考。今人洪本健亦說:“歐本意即指韓愈。歐論文,每言及韓,欽佩之至,未嘗言謝也。”⁵²認為歐陽修極度推崇韓愈,但對謝朓的文學表現未曾置辭評論,不太可能突然用謝朓的僻典。查金萍也說:

筆者以為指韓愈更為貼切。首先,王安石作為當事人,他的理解大致不會錯,任何指代都脫離不了一定的語境,作為深明語境的荆公來說,他的理解應該是不會出錯的;其次,“翰林風月三千首”指的是李白的詩歌,“吏部文章二百年”作為對仗句,應該不會拿一個南朝人並且同樣擅長於詩的人來進行對仗,所以,從詩歌本身來看應該是指擅長文的唐人韓愈。⁵³

查金萍從王安石酬詩回推歐陽修的論述語境,他認為既然荆公以韓愈入詩奉酬,則吏部自然就是韓愈。這樣的理由似乎還是出於翰林應該就是李白,吏部

50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73,頁1057。

51 同上注,卷2,頁37。

52 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476。

53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46。

也應該就是韓愈的主觀感受,是否可以有更進一步的客觀論據? 以下則就韓愈與二百年的時間關係問題來進行論證。

對於二百年的時間範圍,莊綽曾提出兩種計算方法,第一是從建安到南朝宋元嘉年間,計二百三十餘年,這是以沈約讚謝朓語為依據的計算方法。另一種則是從北宋嘉祐年間往前推算至唐代元和年間,合計應為二百五十年,可化約概算為兩百年,這則是以韓愈文章重新受到北宋文人重視的時間算法。然而韓愈一生經歷多位帝王,何以要特別以憲宗元和時期為計算點? 這與一般從生卒年來計算的方式不同,所以莊綽的計算方式應該還有修正的空間。從蔡上翔所舉例子來看,二百年確實是歐陽修一再提及的數目,當有其特殊意涵及計算方法。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曾提及幼時學習韓文的過程,並且談到中舉後對韓文的發揚提倡: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⁵⁴

文中說從及第至於今有三十餘年,歐陽修於天聖八年(1030)進士及第,《記舊本韓文後》至少寫定於1060年之後。至於本文所討論的《贈王介甫》大致作於1052年左右,早於《記舊本韓文後》。至於《讀蟠桃詩寄子美》則成於慶曆五年(1045),因此蔡上翔雖舉此二例為證,但時間次序必須調整,最早提出二百年數字者為《讀蟠桃詩寄子美》中對韓、孟文“寂寥二百年”之說,接著是《贈王介甫》“吏部文章二百年”,最後才有《記舊本韓文後》謂韓文二百年後重現之說:

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⁵⁵

54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73,頁1056—1057。

55 同上注,頁1057。

三文次序雖然可作調整,據《記舊本韓文後》所說,韓文流行當是自天聖八年歐陽修進士及第當年補綴開始算起,韓愈則卒於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兩者間隔約二百零六年,故而二百年是化約後的概數,但這便與莊綽所說從元和到嘉祐二百五十年仍有段差距。

二百年對歐陽修來說是他發揚韓文具有意義的數字,所以在上述的三篇詩文中,就固定選擇以二百年寫入。至於莊綽推測是從建安至元嘉的二百三十年,或嘉祐至元和的二百五十年,都是計算基點的推論錯誤,乃至於潘永因雖贊同吏部為韓愈,卻疑“二百年不切耳”,⁵⁶也是未明白此間距的意義。“吏部文章二百年”,正是歐陽修自己推算自韓愈亡後,到其補綴韓文,使其行於世止,間隔計約兩百年。他在《讀蟠桃詩寄子美》又說到要復興韓愈之文:“我不能飽之,更欲不自量。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強。誠知非所敵,但欲繼前芳。”⁵⁷因此,二百年之後正是再度復興繼承韓文的時刻。韓文歷經二百年之沈寂,至此乃大行於世,於是對於歐陽修之所以寫下“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的用意,也可嘗試由劉勰“反對為優”的原則解讀,亦即出句可視讚頌李白詩歌在當世之極盛,對句雖有韓愈文章曾隱沒二百年之意,但德者不孤,即使於當世未受到重視,在後世同樣能得賞識而顯揚。是以“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不僅代表歐陽修對自己的要求,也表示出他冀望王安石也能夠傳承發揚文章的期許。

釐清二百年對歐陽修復興韓文的特定時間意涵後,則《贈王介甫詩》中的吏部文章二百年也就可以確定是指韓愈。然而朱翌提出孫樵已用二百年來稱揚韓愈,那麼歐陽修是否用了孫樵的文章典故?首先,孫樵文章雖亦提到唐代“二百年間獨高韓吏部”之文,但計算向度並不相同。二百年是籠統的數量,大概是唐初到韓愈生活的時間,與歐陽修從韓愈亡後到補綴其文的計算方式不同。然而孫樵之文不會是歐陽修用典之參考來源,尚有另一根本原因。孫樵字可之,一作隱之。生卒年及里貫不詳。他是唐末重要古文家,蘇軾《謝歐陽內翰書》曾說:“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

56 潘永因:《宋稗類鈔》,卷19,頁8b。

57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卷2,頁37。

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⁵⁸由韓愈、皇甫湜到孫樵，看似一脈相承，但韓愈卒於長慶四年（824），孫樵則於宣宗大中九年（855）方爲進士，這已是韓愈亡故後三十年的事情了。廣明元年時（880），僖宗因黃巢之亂入蜀，曾詔孫樵赴岐隴行在，中和四年（884）時他作文集並有自序。由此看來，孫樵的主要活動時間應在韓愈逝世之後，因此不太可能發生《耆舊續聞》中所說他有上韓愈書信的情況，文集中亦不見有此篇文章。至於朱翌所說乃見於《與高錫望書》，確實存於孫樵的文集中，故當以朱翌所說之文爲是。

孫樵確實亦頗推重韓愈，他在《與友人論文書》便自道：“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⁵⁹這正與蘇軾的說法可相互參看。他對韓愈《進學解》也曾作出直接的評論，《與王霖秀才書》稱：“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如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⁶⁰這些評述都顯示他對韓愈有一定程度的推崇。但《與高錫望書》中雖提到唐朝二百年獨高韓吏部之語，不過這篇文章卻不是要稱頌韓愈。孫樵此封書信主要是與高錫望討論史法寫作的相關問題，其文云：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⁶¹

從其內容來看，孫樵最認同司馬遷及揚雄之史才，韓愈雖爲有唐一代文采最高之文士，但就史才來說，韓愈尚不及班固，更在二人之下。孫樵的批評主要是針

58 蘇軾：《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107，卷75，頁1b。

59 孫樵：《孫可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083，卷2，頁8b。

60 同上注，頁7a。

61 同上注，頁2b。

對韓愈修纂的《順宗實錄》，他認為古代國君不得視史，但韓愈修史卻讓憲宗觀覽糾正，有背史家的風骨。另外孫樵還針對以俚語入史的方法提出批評，《與高錫望書》又說：

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為俚言奇健，能為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邪？⁶²

韓愈詩文多有常言俚語、奇詞僻語之使用，孫樵雖推崇韓文，但卻批評當世史家認為應將俚言寫入史書的主張，可能就是受韓愈影響所造成，故他直接指出韓愈未知史法。那麼連結上下文來看，這篇給高錫望的書信中，雖提到唐代以韓文最高，但文章主要用意並不在頌揚韓愈，全文反而意在批評韓愈撰史的問題。那麼歐陽修若移這段文字來稱讚韓愈，便為不察之錯用。因此，“吏部文章二百年”雖與孫樵文章語句類同，但孫樵是指唐初至韓愈之間的二百年，且文意主要在批評韓愈的史學，與歐陽修的用意不同。因此，即使歐陽修曾寓目孫文，但此句應屬於創造性的詮釋改變，不能視為化用孫樵的文章典故。

五、結 論

文人筆記、詩話作品多有對前人詩文作品探索的記載，或是針對詩詞文句，或是記述傳聞佚事。其中解讀詩文含義，或論其本事者，往往透過個人的探索領會，進行類似作箋式的解讀，其中不乏有能更探明詩義之說，但也有過度詮釋，甚至道聽塗說的可能，必須細待釐清，未可一味採用；至於許多仿如親見親聞的佚事紀錄，真實性更值得懷疑。尤其當發現記載互有異同，或帶有明顯批評性質的說法，則不得不考慮作者或輯錄者的意圖。透過本文的考察，發現

62 孫樵：《孫可之集》，卷2，頁3a。

歐陽修、王安石二人之間本該是屬於友誼交好的酬贈詩作，竟被後世文人從掌故本事的考察切入，逐漸附會成二人相互攻訐之事，將王安石刻畫成自大狂傲之徒，歐陽修則變成爲讀書不博者，扭曲二人形象，影響讀者對二人交誼本質的認識。不過，從本文的考察結果來看，這些抨擊王安石的論述，雖看似爲當時主要潮流，反映出時人將政局歸咎王安石的心態。然而王安石雖有所蒙冤，遭到惡意曲解，但也不是被全面性的無情批判，實際上仍有不少人維護著王安石。兩派之間或許是因學術傾向、政黨歸屬而有所不同針對詩文論述者，亦有從客觀角度，希望能探明詩句掌故，或釐清詩人作意，嘗試替王安石辨解的說明。另外，從本文對《贈王介甫》中“吏部文章二百年”的掌故探討來看，文人的好事附會或刻意求索，可能也是造成後世紛歧詮釋發生的原因。後世文人出於好奇炫博，在有心獨作鄭《箋》的心態趨使下，往往在原本簡單顯明的詩義，加諸許多牽強附會的說法，導致出現頗多歪曲事實的內容，影響後人解讀，是以今日在閱讀這類筆記，對其中的記載實不得不謹慎待之。

（作者：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王安石:《臨川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0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王安石撰,李壁注、李之亮補箋:《王荊公詩注補箋》。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

王十朋:《梅溪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15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王其俊主編:《中國孟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2 年。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

朱翌:《猗覺寮雜記》,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3 編),冊 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

李延壽:《南史》,《百衲本二十四史》,冊 2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吳玕:《優古堂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2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吳景旭:《歷代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4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邵伯溫:《聞見錄》,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 2 編),冊 7。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筆記小說大觀》(第 35 編),冊 1。臺北:新興書局,1983 年。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馬斗全:《南窗雜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

孫樵:《孫可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0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孫光浩:《王安石冤屈新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張彥遠著,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年。

莊綽：《雞肋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4編），冊7。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陸游：《老學庵筆記》，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5編），冊8。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

陳鵠：《耆舊續聞》，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冊5。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梁啟超：《王安石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陸家驥：《對聯新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曾鞏：《元豐類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惠洪：《冷齋夜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冊9。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彭大翼：《山堂肆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97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葉夢得：《避暑錄話》，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2編），冊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趙與時：《賓退錄》，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冊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蘇洵：《嘉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歐陽修著，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歐陽修：《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蘇軾：《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潘永因：《宋稗類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3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二）論文

李貴：《〈漫叟詩話〉作者李公彥及〈全宋詩〉〈全宋文〉相關詩文考論》，《東華漢學》第14期（2011年12月），頁83—103。

陳逢源：《從五賢信仰到道統系譜——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聖門傳道脈絡之歷史考察》，《東華漢學》第19期（2014年6月），頁121—155。

陽繁華、唐成可：《論宋人筆記小說中王安石的負面形象》，《合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 年第 2 期,頁 32—35。

錢建狀、王兆鵬:《宋詩人莊綽、郭印、林季仲和曹勛生卒年考辨》,《文獻》2004 年第 1 期,頁 100—107。

The Controversy of the Allusion “Two Hundred Years of Writing of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in Ouyang Xiu’s “A Gift Poem for Wang Jie fu”

Chiang, Lung-Hs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uyang Xiu (1007 – 1072) wrote a verse that reads “Two hundred years of writing of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to Wang Anshi (1021 – 1086).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referent of “Ministry of Personnel,” which resulted in distortion of the images of Ouyang and Wang in anecdotal records. By analyzing the journals and notes on poetry, this study surveys th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the allusion to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found in Song-dynasty sources. Some argued that the phrase carries Shen Yue’s (441 – 531) praise of Xie Tiao (464 – 499), while others suggested that it was derived from the writing of Sun Qiao (ca. 867). The different theories on the source of this allusion have resulted in various anecdotes with denigration of the images of Ouyang and Wang. These speculative views were mainly based on the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respective scholars. Without offering specific evidence, these premature views of the allusion in the poem even form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time when Ouyang Xiu glorified the writing of Han Yu (768 – 824) and when Sun Qiao criticized Han, and thereby argues that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refers to Han and “two hundred years” to the time when Ouyang Xiu succeeded Han’s literary legacy. The verse “two hundred years

of writing of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was not an allusion but was Ouyang Xiu’s creation. This study can clarify the context of the controversy and reconstruct the accurate images of Ouyang Xiu and Wang Anshi. In addi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quence and comparison of relevant data, this study provides examples and allows readers to recognize and analyze the poet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allusions as recorded and discussed in notes on poetry.

Keywords: Ouyang Xiu, Wang Anshi, gift poems, Ministry of Personnel, “A Poem in Response to Yongshu’s Gift Poem”.